

焦點

熱議

陳光南

反對派爲了操縱今年三月立法會補選的結果，極力避免出現反對派有一個以上的候選人而搞了一場「初選」。結果，由美台勢力控制的「初選」，選出了新界東的范國威、九龍西的姚松炎兩個「候選人」。「初選」的條款，就是參加者不准輸打贏要，既然參加了「初選」，所有在「選舉」中落敗的，一律不准再報名參加3月11日的正式補選。

這次有操控的「初選」，實現了美台勢力的部署。參加者必須是搞「港獨」和「本土主義」的激進派，以圖實現「泛民大洗牌」，全面換血。他們企圖在香港製造更加對抗的局面，利用香港作爲政治基地，滲透和輻射內地。於是挑動民運分子以香港作爲榜樣，衝擊內地的政治穩定，阻撓中國專心致志發展經濟、建設「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破壞中國的發展和產業升級的道路方向。

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美台勢力搞了一個「雷動計劃」，明目張膽進行所謂「棄保

」，干擾選民的抉擇，操縱選舉。使朱凱迪以八萬多票當選，成爲票王。朱凱迪進入立法會之後，立即成爲了「拉布」的「爛頭蟀」。美台勢力所需要的就是敢於破壞和搗亂的朱凱迪式與台灣有密切往來的政客，於是部署了「台灣」「港獨」合流的安排，並企圖利用三月的補選換血。

「初選」騷不能代表民意

他們想出了一個控制「初選」的鬼主意。「選民投票」的結果計分爲45%，港大民意調查計分爲45%，政黨投票計分爲10%。「選民投票」的結果最難預測，分分鐘會超過他們的計算，又難以控制。港大民意調查則完全可以操作，只要磅水，鍾庭耀立即識做，誰勝出都可以達到預期效果。最後的10%，就是收了肥佬黎捐款的政黨，必然跟到十足，起着守龍門的作用。這種選舉方式，能夠控制的程度可說達到100%。

誰在幕後操控「初選」結果？

個人同台灣的關係非常好，而且又是「港獨」和「台灣」合流的鼓吹者和執行者。

「兩獨」背後勢力的介入

2013年9月6日，公民黨毛孟靜和「新民主同盟」范國威，率先在「台灣」立場鮮明的台灣《自由時報》登廣告，提出「港獨反中」路線，尋求「台灣」力量支持。2014年2月22日至23日，老牌「台灣」分子簡錫堃應「佔中」組織者邀請，來港培訓「非暴力抗爭」骨幹。2014年9月28日至29日，台灣「太陽花運動」組織者林飛帆、陳爲廷在台北率近百名「台灣」組織成員，衝擊香港駐台辦事處，聲援香港「佔中」。

在「佔領」中環期間，所謂本土派在金鐘「佔領區」海富天橋上，公然掛出了兩幅分別寫有「台灣獨立」及「台灣獨立建國」的直幡。這些事實都說明，「兩獨」合流，已經有具體的行動。所謂「自決派」的朱凱

迪、姚松炎、羅冠聰及黃之鋒等「暗獨」分子，一早就與台灣「獨派」有合作的紀錄。「台灣」政黨「時代力量」在台北舉辦所謂「自決」論壇，朱、姚、羅等赴台出席，與張信堂及林飛帆等「台灣」搞手對談「抵抗極權中國」的策略。他們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簽署了擁護香港基本法的確認書，當選後亦曾宣誓效忠基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但這些宣誓均屬虛情假意，無一句是真。

美國勢力認爲，在香港鼓吹「台灣」，是人權和言論自由的表現，一定會得到美國人的支持。美國衆議院也通過了美國官員旅行法，讓官員可到台灣進行高級別的官員會談和會面，挑戰中美之間建立的公報。反對派的「初選」，做大騷的味道很濃，無非是向美國主子傳遞信息：我們正在物色更加激進的人物進入立法會，勿忘了通過肥佬黎磅水。

資深評論員



名家灼見

饒戈平

但凡一項重大的政策或議題，通常都會產生相應的話語體系，形成自己特有的專門用語或概念。「一國兩制」創造了一種特殊語境，而「中央全面管治權」則是體現其精髓的一個重要的專門概念。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把堅持「一國兩制」、保持香港和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列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列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他強調，爲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在這裏，習近平以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身份，以中共黨代會報告的形式，重申了「中央全面管治權」這一概念，並且把它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提升到保障「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實施的最重要因素。這一論斷成爲近年來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最大亮點，抓住了「一國兩制」實施中的關鍵，也構成習近平新時代「一國兩制」思想的一個核心內容，引起海內外高度關注。

中央管治權乃基本法原意

「中央全面管治權」概念最早出現在2014年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把它確定爲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基礎與核心。從其公布之日起，香港社會各界就毀譽不一、議論紛紛。擁護者有之，困惑不解者有之，曲解詆毀者有之。有人把它說成是中央對港政策的重大修改，有人說是對香港高度自治權的貶損，鼓吹予以抵制；更多的是不甚理解「全面」二字的內涵和意義。這些爭議集中反映了是否及如何全面準確地理解「一國兩制

」方針的問題。那麼，中央爲什麼要提出這一看似全新的概念，其實質內容和含義是什麼？它同香港高度自治權是什麼關係呢？如此等等需要我們有一個正確認識。

一、為什麼要提出中央全面管治權概念

這一概念是針對「一國兩制」在港澳深入實施階段的問題和需求提出來的，是爲了保障「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地實施而提出來的。「一國兩制」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治國理政模式，對國家、對香港都是全新的實踐。一段時間以來香港社會存在着重「兩制」、輕「一國」，重高度自治、輕中央管治的傾向，把有關香港的管治僅僅理解爲「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忽略、排斥中央管治權，把中央管治權的行使視爲對高度自治的干預，成爲影響「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實施的認識上的障礙。而對港工作隊伍本身也曾出現過對中央管治權認識不足的現象，未能有效體現中央在「一國兩制」實施中的主導作用。有鑒於此，有必要對被忽略、被曲解、被污名化的中央管治權正名，有必要撥亂反正、回歸本意。中央不但應理直氣壯地行使對香港特區的管治權，而且還要如實地宣示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中央管治權絕非一個憑空捏造出來的概念，更不是一個隨意和臨時提出來的概念，而是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原意、對本已存在的法律事實的一種重申和強調而已，也是對被曲解的認識的一種必要糾正。

這裏，首先有必要糾正的是對香港管治權的一種不全面不準確理解：即有關香港的管治只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顯然有違法律，不符事實。須知隨着中國收回香港，管治香港的權力從英國人手中交還到中國人手中，不應也不可能全部、直接地過渡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首先是交還給中國這個主權國家，由中國恢復行使主權

，將香港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在此前提下，在保障中央代表國家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前提下，才產生了由中央授權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妨說，沒有中國收回香港，沒有中央對香港的管治，就沒有今天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僅僅是有關香港管治權的一部分，在它之外、在它之上當然還存在着中央權力機關對香港的管治。一個有關香港管治權的完整概念，應該是中央管治權和中央授權下的香港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這本應是一個人盡須知的法律常識，遺憾的是，在香港卻長期遭到忽略和曲解。

二、中央管治權的內涵和依據

還有人雖然不否認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但回顧法律和事實，把中央管治權僅僅局限於涉港外交、防務，這顯然也是一種不全面、不準確的說法。我們不妨讓法律本身、讓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來說明事實真相。

首先看作爲國家根本法的憲法的規定：憲法第三條規定了單一制國家結構，中央和地方是統一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第三十一條及第六十二條第十三款規定，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關權需要設立特別行政區，有權制定法律，規定在特區實行的制度；第六十七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法律，有權宣布全國進入戰爭狀態，有權決定全國或個別地區進入緊急狀態；第八十九條第四款規定，作爲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的國務院有關權統一領導全國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工作等等。無疑，憲法規定了、包含着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

再看看作爲香港憲制性法律的基本法的規定。一部基本法不但是一部授權香港特區高度自治的法律，也是一部規定中央管治香

港權力的法律。基本法至少明確規定了中央權力機關在以下十多個方面對香港的管治權：

第一，制訂基本法、規定在香港實行的制度（序言）；第二，對行政長官和特區主要官員的任命權（第四十五條）；第三，管理與香港有關的外交事務的權力（第十三條）；第四，管理與香港有關的防務的權力（第十四條）；第五，對基本法的解釋權（第一百五十八條）；第六，對基本法的修改權（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七，對香港政治體制發展的主導權（附件一、附件二）；第八，對香港立法會所定法律的備案審查權（第十七條）；第九，命令香港實施全國性法律的權力（第十八條）；第十，對香港特區追加授權的權力（第二十條）；第十一，宣布香港進入戰爭狀態或緊急狀態的權力（第十八條）；第十二，就有關事務對特區政府發出指令的權力（第四十八條第八款）。

除上所述，基本法還規定香港特區直轄於中央政府（第十二條）；行政長官要對中央政府負責（第四十三條）；特區行政長官在香港負責執行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款）等等。這些規定都是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款，明確無誤地彰顯了中央對香港擁有廣泛全面的管治權，中央行使這些法定權力是對法律的遵循和堅守，而不是超越、更不是背離。對照基本法，任何不帶偏見、尊重法律的人，都不會得出中央權力只限於外交國防的結論。持此論者無異於自欺欺人、對抗法律。

香港不能抗拒中央權力

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不但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保障，而且有充分的法理依據，它們植根於國家主權原則和單一制國家權力結構。

憲制新秩序確保憲法權威

王曦煜

特首林鄭月娥1月12日在立法會問答大會上，駁斥反對派所謂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高鐵「一地兩檢」合作安排所作決定欠缺法律基礎。她首次公開提出特區憲制新秩序的問題，並一針見血地指出，香港回歸二十年，仍有一部分人不願意接受，甚至抗拒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確立的香港特區憲制秩序。

特首所指出的抗拒憲制秩序，正是長期以來，造成本地政爭不斷和社會泛政治化的源頭。從政改折戟，到各類針對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攻訐，再到「一地兩檢」的波折重重，可以說「一國兩制」實踐中所產生的諸多爭議，莫不與此相關。

究竟何爲香港的憲制新秩序？追本溯源，回歸前，香港的憲制性法律基礎是以《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爲核心，香港基本的政治架構和制度，都據此所奠定。但伴隨着香港回歸，以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爲核心的新憲制秩序，已經完全取代港英年代的舊憲制秩序。香港主權移交，實際上標誌着香港憲制新秩序的開始，這一點毫無置喙的餘地。

然而，二十年來，香港社會部分人士

仍未能理解，香港憲制秩序是中國憲制秩序派生的、次級的，具有一定獨立性而非完全獨立的特點，有人甚至刻意地忽略、抗拒。尤其是一些法律界精英，單方面強調基本法的「小憲法」性質和地位，漠視香港憲制秩序歸屬於中國憲制秩序的事實，更甚是以普通法的原則去闡述基本法。這種偏頗的做法，顯然與憲法新秩序的發展與重塑背道而馳。

強調憲制新秩序，其實是要扭轉上述這種偏頗的情況，維護和確保憲法權威。但憲法權威，並非如某些居心叵測的人所言，要靠貶低基本法或普通法的地位來實現，這不是一個「抑此揚彼」的二元選擇題。

憲法與基本法是雙生並蒂，共同構成香港的憲制新秩序，同樣重要。正如「一國」和「兩制」必須有機結合，才能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一樣。在充分理解「一國兩制」背後蘊含的憲制背景和憲法精神，正確掌握並接受與憲法新秩序後，相信社會上的許多紛紛擾擾，都會煙消雲散。香港需要這樣一股強調憲制新秩序的清風，吹開當下的重重迷霧。



學者論衡

陳文鴻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日前出席香港青年軍總會大樓開幕典禮時表示，西環（中聯辦）與中環（特區政府）未來「一定會多行理一環」。

是的，中西環共同合作，才是正道。以往那些要兩地隔絕的言論與政策，只是秉承殖民地的做法，目的不是促進兩地共同發展，而是反對兩地融和、反對「一國」之下「兩制」的合作與發展，妄圖回歸後把國家對香港的主權與治權分割。

港澳辦、中聯辦與特區政府，在國家的行政體系內是平行的，都是省部一級的行政組織。三者之中，沒有從屬關係，但當然有主次。在內地體制中，港澳辦與中聯辦爲主，在香港特區之內，特區政府爲主。這是「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不容混亂。但與此同時，港澳辦與中聯辦並不是地方行政單位，前者是中央政府的辦事機構，後者是中央政府在港的代表處。也因此，前者只是在內地協調中央政府各部門、各地方政府與港來往，執行中央政策。後者在香港的功能也只是協調，協調特區政府與內地各部門各地方的關係。

兩辦功能屬於協調，均是依據基本法

中環西環合作才是正道

和中央有關政策執行，並沒有決策權，更不用說指揮內地部門與地方政府，或指揮特區政府。嚴格而言，它們都只是作爲香港各個方面（特區政府與香港社會）與內地各個方面聯繫的橋樑或居於中間的促進者。就如英文facilitator（促進者、幫助者）的作用，不是消極的中介或被動的守關者。

香港與內地的聯繫交流，從來都有互補長短、相輔相成的效果。回歸前，香港的利益歸於英國，英國僅取不予，兩地協同效果發揮有限。本來回歸之後，借「一國兩制」之力，正好發揮協同作用，也能以此促使內地與香港在互補之中創新發展，可惜政策理念在執行中出現波折。不是矛盾對立，便是零和遊戲的惡性競爭，內地與香港在這樣的錯誤情況下均出現問題。

以往國有資產、國家財富不合理地外流，在內地的發展與改革過程中，形成一個極爲惡劣的示範。本來香港的金融服務、國際化網絡可幫助內地經濟拓展國際市場，在互動反饋中促進改革開放，結果並不令人理想。香港也本應與珠三角及更廣

大的內地範圍形成廣闊的經濟區域與創新體系，以內地市場促進香港的服務，以及與國際創新體系的銜接，使香港經濟轉型不是朝股市樓市的投機方向，而是向知識化、國際化發展。背靠內地，香港可成爲與倫敦、紐約三足鼎立的世界城市，把整個亞洲納入腹地，也把香港的經濟與社會文化深化發展。

中央的撥亂反正，定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方向。並給香港未來發展與「一國兩制」實踐提出具體的思路——「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人民幣國際化建設。這正好給香港重新起步的機會。

特首林鄭月娥與新一屆特區政府應依照中央政府的政策，推動香港從當前的政經困境中解脫出來，再創輝煌。「一國兩制」下，兩地的互補合作與協同，落在執行層面便是香港與內地的密切配合。這便離不開特區政府與中聯辦、港澳辦的緊密合作，且合作也不應限於特區政府，而應是香港社會的各方面。

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